

回應〈期待史料重新出土——為日治時期新文學雜誌說幾句話〉

文／翁聖峰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1981年《新文學雜誌叢刊》對台灣新文學研究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史料完整性的出土，對日治時期台灣語文、文化的建構有深遠的影響。台灣文學珍貴文獻的全文複刻或選錄作品複刻仍有其必要，特別是孤本更應當徵求，加速流通，才能深化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

陳芳明教授在2010年6月《台灣文學館通訊》有專文〈期待史料重新出土——為日治時期新文學雜誌說幾句話〉指出：「婁子匡先生主持的東方文化書局，在1981年3月出版的《新文學雜誌叢刊》，對日後國內台灣文學研究確實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他建議《新文學雜誌叢刊》須重新編輯出版，並且補充當年的不足，例如1944年台灣文學奉公會出版的《台灣文藝》，在《叢刊》缺了兩期，未收入的三〇年代的《台灣文藝雜誌》，油印的《風車》詩誌，都可考慮納入新的版本。還呼籲《台灣藝術》以及1933年以後出版的《台灣新民報》應該是文學館到了需要集中心力去徵集的時刻。

確實史料完整性的出土，對日治時期台灣語文、文化的建構有深遠的影響，他期待台灣文學館：「有些放煙火式的、應酬式的、儀式性的活動可以減少，讓沉潛的、累積的史料編輯納入館方的發展重心。」這說法可謂語重心長。十多年前，由於中島利郎無私地將在東京舊書攤所購得的孤本1933年《台灣新民報》捐贈給籌備成立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這份寶貴文獻的出土，使得我們對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面貌有全新的認識，並改寫了這段台灣話文論爭史。

1981年《新文學雜誌叢刊》對台灣新文學研究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在這之前，從1959年至1972年，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周憲文透過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台灣文獻叢刊》309種、595冊、4800餘萬字，雖然受限於當時的物質與政治環境，捨棄了許多地圖或插圖，有的史料內容也被迫刪改，但對戰後台灣文史研究的貢獻實功不可沒。《新文學雜誌叢刊》、《台灣文獻叢刊》出版的年代不同，各有不同的價值，如果從《新文學雜誌叢刊》來論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可能僅聚焦在1920年之後的台灣新文學，然而要全面觀照日治台灣文學，《台灣文獻叢刊》及其他新出土的文獻均須相互參照，論述焦點才不致偏失，筆者先前已有專論〈擴清新舊對峙的迷思——論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之研究不宜偏廢〉詳述此點（《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八期，1993年9月，<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a/ang-seng-hong/sinku-bunhak.htm>）。近年來，由於《台灣日日新報》諸多新文獻的廣泛被運用，以往較少被注目的1920年之前的台灣文學研究已有長足的進步，為日治台灣文學的整體研究向前跨了一步。

在中央、地方文化、學術單位、民間或個人的努力下，台灣文學的文獻結集與出版較之二十年

前已累積相當成果，如成文出版社複刻《三六九小報》、南天出版社複刻《風月報》（《南方》）、《民俗台灣》，對台灣（通）俗文學與文化研究甚有貢獻，有助於研究成果的累積，龍文出版社複刻《詩報》對日治時期的傳統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提供許多方便。先前五南書局複刻的《台灣日日新報》紙本，結合漢珍版或大鐸版的《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對擴展日治時期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有深遠的助益。去年（2009）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與台南市立圖書館合作，將現存《台南新報》1921至1937年間的報紙史料整理出版，對後續研究的貢獻同樣是可以預期的。

除了文獻複刻，目前也有許多學術單位或民間公司投入台灣相關資料庫的建置，不過有的可能是版權因素、典藏維護，或是民間開發資料庫須反應成本，使得這些資料庫僅有少部份是無條件開放給讀者使用，還有蠻多的資料庫必須申請或購買才能使用，無疑地，這對台灣文獻的運用與流通是有所限制的，因此，台灣文學珍貴文獻的複刻仍有其必要，特別是孤本更應當徵求，加速流通，才能深化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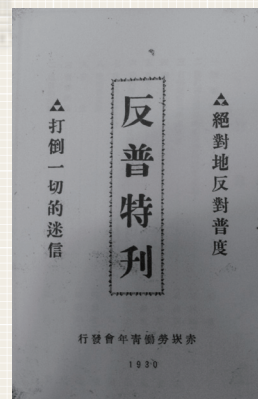
我曾在1997年6月的《台灣文獻》〈《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著述篇》的若干問題〉（<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a/ang-seng-hong/ge-bun-chi.htm>）提到：「也許基於某些『特定』的目的，對一些已十分普遍的文獻卻一印再印，由平裝而精裝，並加裝精美的函套，這雖亦有助於某些『特定』受恩寵的文獻之傳播，但有限的經費卻可能因此舉而產生排

擠作用，影響其他更有價值的孤本、珍本文獻的複印、問世，更嚴重的是有的文獻可能在搶救之前就已破壞殆盡而與世永隔，這種現象實在應當值得吾人深切檢討反省。」十年後再來反思這段話，目前台灣文學的文獻整理已較前進步許多，然而哪些文獻是優先必須搶救的？哪些可能又流於錦上添花？確實值得省思。

除了陳教授所提的重要文獻外，在日治台灣文學占有一席之地，卻從未被複刻、刊印的文獻，可能必須優先整理，如《明日報》、《曉鐘》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都可檢索到，但如無該館的借書證，就無法在網路上閱覽全文，清晰版的《赤道報》創刊號可見於中研院台史所「楊雲萍文書」資料庫，惟該資料庫目前仍在測試階段，在館外是無法使用的！至於《洪水報》，部份內容也可見於私人收藏，這些小報對日治時期左翼文學的研究甚有助益，可惜文獻不夠流通，無法充分被學界運用。



《曉鐘》創刊號封面。
（本文作者提供。現藏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反普特刊》封面。
（提供／李筱峰）

目前手上的《反普特刊》是由李筱峰教授致贈的，是1930年代反對普度、打倒迷信的文論與創作。1934年大溪革新會李獻璋所編的《革新》，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http://nbinet2.ncl.edu.tw/>) 並無法搜尋到，目前僅在吳三連台灣史料中心 (<http://www.twcenter.org.tw/>) 可見到，如獲刊印，應更利於各界的運用。

日治時期新舊文學研究不可以截然對立視之，如罕受注目的《同仁》雜誌，1924年10月1卷3號有以文言文論說〈論白話文之必要〉，這與以往多數人所認知的新舊文學嚴格對立的觀點差異甚大：



《同仁》雜誌，1924年10月1卷3號。
(翻拍自台灣佛教史料庫)

《台灣文藝叢誌》也是日治時期非常重要的傳統文學刊物，至今尚未被複刻過，甚為可惜。二二八事件不幸罹難的台灣省參議員、《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一般人可能僅以新文化人視之，不過，1945年1月其妻染病疾過世，王添灯特別創作漢詩〈為王妻黃氏嘆賦〉悼念其妻，在《王添灯紀念集》也還有不少漢詩作品。

純文學刊物可能全文複刻，有些專門性刊物也可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值得選錄，如《語苑》、《台灣時報》、《台灣婦人界》、《南瀛佛教會報》、《台灣教育會雜誌》都有不少文學作品。而《新高新報》僅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昭和新聞》、《南瀛新報》僅在臺灣大學有典藏，如能複刻全文，或選錄文學作品複刻，對研究者應都很有幫助。

日治時期文學的文獻近年刊印不少，並已累積相當成績，如2006年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由黃英哲教授主編的4冊《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為日治時期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帶來許多便利，然該書僅收錄原文為日文的「雜誌篇」評論，至於發表在報紙、專書，或以漢文發表在雜誌上的評論則不在收錄範圍，這類尚未被整編的文獻還有更多可以集結出版的，可見，台灣文學的文獻複刻或是整編，仍有許多空間等待我們持續去開展。☒

《台灣文學史料》集刊 徵稿啟事

史料是建立歷史的基礎，研究者藉由史料的蒐輯與解讀，得以重構已逝去但孕育出現實的曲折發展；然史料非自然留存，需人為加以記錄，台灣文學館為以台灣文學為主體，負有記錄、保存台灣文學在各歷史時期所孕育出的多元文學發展之使命，《台灣文學史料》集刊因應此目的而生，誠摯邀請海內外文壇先進賜稿，徵稿主題為四大面相，分為十項專欄如下：

（一）創作、閱讀私經驗

1. 我的創作經驗（或第一篇作品）
2. 啟發、影響我的人或書

（二）文學因緣

1. 與文壇重要人士往來經歷（文壇史話）
2. 文學團體（相關回憶）
3. 文學雜誌（相關回憶）
4. 文學文物（相關回憶）

（三）文學紀事

1. 文學事件（相關回憶）
2. 文藝風潮（相關回憶）

（四）文學史話

1. 重要文獻憶述
2. 既有文學史著的正舛補闕

來稿請註明投稿專欄，來信請寄至：

700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史料》編輯小組收

（來稿請附word檔，並自留底稿，本期徵稿至2011年6月30日截止）

聯絡人：本館研究典藏組楊先生(06)221-7201分機2200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翻譯出版補助作業要點」，自即日起接受申請。

詳情請上網瀏覽www.nmtl.gov.tw，或洽研究典藏組曾小姐06-2217201分機2226。